

革命历史教材
主题教育辅助丛书

红色贵州



武警贵州省总队政治部

革命历史教材
主题教育辅助丛书

红色贵州



红色贵州

武警贵州省总队政治部



印 刷:贵阳天马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890×1240 1/大 32

印张字数:6.5 印张 160 千字

版次印次:2009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编委会人员组成名单

编委会主任:周爱民 张生枝

编委成员:侯民先 朱庆中 郭游文 王余生

李儒义 陈楚南

主 编:韩云鹏

副 主 编:张保民 段舜贤 刘 超

执行主编:周大军

编 辑:谢亚鹏 李小东

校 对:沙作昌 梁春松

图片提供:秦良静 谢兆松 邓 刚 魏 星

了解贵州 热爱贵州 建设贵州

武警贵州省总队 总队长周爱民少将 政委张生枝少将

对于贵州,初来乍到者往往会惊叹于其奇美的风光、别样的风情,可能会用许多美妙的词语来赞美它,歌颂它。而熟知贵州的人则会迷醉于其深厚独特的历史文化,不管是神秘莫测的古夜郎传说,还是独具魅力的革命传统,都堪称经典,让人无限留恋。

贵州确实是个神奇而又美丽的地方!

正如《贵州恋歌》中唱的那样:“我曾把你的容貌遐想,还是惊叹你这般漂亮。撩开你的神秘的面纱,禁不住我心荡漾。青山秀水画中来,四季如春气候爽,大森林瀑布群,让人痴迷激扬。贵州,一个美丽的地方,藏在深闺的地方,只要看上一眼就会永远不忘。贵州,一个多情的地方,一见钟情的地方,只要牵手一回就会记在心上……”

我们有幸驻守在这片热土上,每一名官兵都应该感到无比骄傲、无比自豪。对我们脚下的这片热土,我们也应该去了解它,热爱它,这样才能自觉地融入它,更好地守护它。

有鉴于此,我们对总队政治部组织编撰的《红色贵州》、《多彩贵州》两本书,给予了高度关注和赞赏。这两本书是按照总队党委的工作部署,结合部队今年开展的“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教育而编辑的,主要目的

是让官兵了解脚下的这片热土，了解自己所生活地方的历史、文化、民族、地理等知识，从而激发广大官兵对驻地贵州的深深爱恋之情，使官兵在面对多样化任务和实现总队跨越式发展中勇于承担、乐于奉献、甘于牺牲，在本职岗位上践行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践行永远做党和人民忠诚卫士的铮铮誓言。

这套丛书内容丰富、语言生动，既富知识性，又具可读性。从五六十万年前的古人类文化遗址，到司马迁所著《史记》里的夜郎自大典故；从1413年永乐皇帝宣布设立贵州布政司、南七北六之第十三个行省正式成立，到贵州各民族开发故土、创造灿烂文明和美好山水的辉煌历程；从各族人民反抗压迫追求民主的不屈斗争，到党和红军在这片神奇土地上完成的伟大转折、经典绝唱……这是贵州总队首部较为完整、全面介绍驻地贵州历史、地理、民族和文化的丛书，也是部队搞好主题教育的好教材、好载体。我们相信，这套丛书必将发挥其教育、激励、熏陶、塑造功能，为总队走“全面加特色”路子、推动部队建设新进步起到强信心、鼓士气、砺斗志的巨大作用。

脚踏大地，胸怀感激，那些远去的面容、逝去的时空，逐一复活在我们的眼前。传说中民族的英雄、党的儿女、革命的志士，渐渐与壮美的河山绮丽的风光重重叠叠合而为一，似是要透过这贯通千年的时空隧道，向我们演绎那惊世的壮举，向我们昭示百代的伟恋：人民子弟，忠诚卫士，守土有责，守土尽责！

2009年春于贵阳

目 录

序 言

第一章 未发一枪,中央红军静悄悄进入贵州

战略转移,曙光初现黎平 1

担架上的“阳谋” 6

第二章 三军拱卫遵义城,万丈光芒铺大道

强渡乌江 12

智取遵义 15

抢占娄山关 18

乌蒙深处有电灯 22

“遵义会议”石破天惊 25

苟坝,毛泽东攥纱帽 32

遵义城下洒热血,三军征途哭奇男 36

第三章 史诗般的“四渡赤水”

狼烟四起,背水一战——敌人“逼”出来的一渡 40

打乱奇思,出敌不意——主动“谋”出来的二渡 45

余勇可贾,胸中甲兵——精心“酿”出来的三渡 50

出奇制胜,稳操胜券——三军“呼”出来的四渡 57

	伟人一生的扛鼎之作	60
第四章	红色经典,文化遵义	
	红军菩萨	65
	红军长征成就“国酒”	71
	金融界的“麦加”——毛泽民	76
	红军歌谣	81
第五章	红二方面军在贵州	
	不明底里的紧急电令	90
	萧克巧施“草帽计”	94
	全歼“飞毛腿团”	97
	深山老林中的外国传教士	100
	任弼时与“山神爷”	104
	根据地在我们的脚板上	109
	飞渡乌江天险鸭池河	115
	红旗卷过黔大毕	120
	开明绅士周素园	125
	将军山伏击战	129
	意外的损失	133
	乌蒙山回旋战	135
	红二、六军团确定北上	141
第六章	贵州革命斗争史及重大事件简编	
	不熄的烽火——息烽集中营里的斗争	145
	炼狱忠魂——息烽英烈谱	162
	息烽集中营烈士诗选	171
	抗战中的贵州	173

发生在贵州的重大事件	177
附：一、各路红军在贵州的时间、经过的县份	184
二、部分革命先烈简介	185

第一章 未发一枪，中央红军 静悄悄进入贵州

战略转移，曙光初现黎平

1933年初，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无法立足，被迫迁入江西瑞金中央苏区，使“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苏区得到进一步贯彻。他们坚持城市中心论，抛弃毛泽东一贯主张且行之有效的正确战略战术，固执推行“进攻路线”，实行宗派主义，对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坚持正确路线的军事奇才毛泽东被迫远离核心领导层。同年10月，即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一个月后，由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抵达中央苏区，临时中央最高负责人博古不懂得军事，于是一味依赖李德，把红军的指挥权交给他。从此，红军及苏区形势急转直下，至1934年10月上旬，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及直属纵队离开瑞金，踏上漫漫征途。此时，一向冒险的博古李德又开始实行逃跑主义，消极避战，经过连番苦战奔突，12月1日，红军跌跌撞撞浴血冲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湘江后，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由出发时的8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

由于博古、李德推行错误的军事战略，红一方面军始终摆脱不了敌人的围追堵截。但是，李德拒绝承认自己战略上的错误，坚持要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毛泽东和红军高层许多领导人心

红色贵州

中充满了危机感。因为在前面蒋介石正布置了一个口袋等着红军去钻。在这一生死关头,红军迫切需要军事战略的转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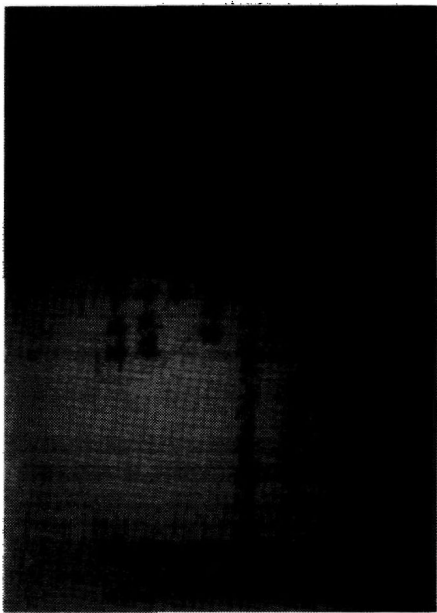
经过湘江战役的惨重教训,红一方面军中所有指战员和红军战士都进一步认识到毛泽东军事指挥的正确,因此,全军上下渴望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

1934年12月11日,红军的先锋团——红一军团的二师五团攻下了守卫薄弱的湖南省通道县城。第二天下午在位于贵州边界上的通道县,中央和军委召开了一次仓促的非正式会议,史称“通道会议”。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主要的军政首脑人物都参加了。这是一次临时性的却非常重要的会议。

会议是在城外附近农村某处一家农民的厢房里举行的,当时

这家农民正在举行婚礼。李德说,这次会议是领导军队的党的机构——军事委员会的紧急会议。这次会议的特别之处是,两年多以前被撤职的毛泽东被请回来参加会议,并且立即起了主导作用。这是已被解除军权两年多的毛泽东第一次复出的会议。

会议只讨论一个问题,即目前的战略方向问题,要不要北上湘西与贺龙、萧克的红二、六军团会合。会议一开始,李德就用坚定的口吻宣称,中央红军只有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才会有前



红军经过锦屏县时,当地苗族青年写的诗

途。

对于李德的提议，大家听了都默不作声，只有博古表示赞同。但是博古的话还没说完，就被一个不大却是很坚定的声音打断了，大家一转身，只见毛泽东站起身来，用他那缓缓的语调说：“目前确实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危机关头。但是我们对形势的分析还应清醒一些。在湘西，国民党的部队正在集结，这是前两天就得知的情报。北上湘西等于送死。在湘江边我们已经有了硬往敌人口袋中钻的经历，即一次损兵折将的惨败，教训不可不吸取啊！流动作战也确实危险，但相对于自己送上门去送死就要明智的多。所以，我认为必须马上转兵，西进贵州，那里王家烈的兵力较弱，形势对我们要有利一些。”

毛泽东的发言立即得到彭德怀、刘伯承、周恩来等人一致赞同。李德、博古看自己的意见是少数，便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于是否定了李德继续北上与二、六军团会合的意见。由此，李德开始明显地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漠视，这是前所未有的；而且从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乃至博古等人态度的变化中，李德深感到他的地位在开始动摇，威信在明显下降，大家仅仅把他当成一个军事顾问而不再是最高的军事指挥者了。发生这种微妙的变化的象征，就是毛泽东开始有了发言权。

1934年12月中旬，按照通道会议的部署，红一方面军向西突入贵州。由于出敌所料，红一方面军几乎未打一仗、未发一枪就悄然进入贵州境内，不费吹灰之力占领了黔东南的黎平县城。黎平位于贵州东南部，在贵州与湖南交界的边境上，是一座比较繁华的县城，当时全县人口约20万人。

主力部队和中央军委于十五六日进驻黎平。蒋介石大感意外，不得不下令调兵进入贵州，但在时间上已比红军慢了一拍。于是，红军在两个月的连续行军作战中第一次获得休整的机会。借此休整机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在黎平又举行了一次重要的会议。

红色贵州

这次会议是在毛泽东及王稼祥等人的积极倡议下召开的。尽管通道会议决定了转兵贵州,但是,毛泽东看到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中还有一部分人,特别是李德、博古并未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想法。所以必须坐下来商讨今后的战略方针,进一步统一认识,在下一步行动计划上步调一致。

李德称病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与会者有博古、王稼祥、洛甫、毛泽东、朱德和林彪等人。会上,周恩来几次发言,公开批评了李德,指出他的军事指挥存在战略上的问题。毛泽东再次阐述了他在通道会议上的意见,并且加重了语气,强调提出必须放弃红军北上同贺龙会师的计划,他说:“根据目前的形势,在湘西创立新的根据地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我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在川黔边区一带,我们应向西挺进,朝贵州第二大城市



红军经过黎平时总政治部发布的与苗民关系指示

未发一枪，中央红军静悄悄进入贵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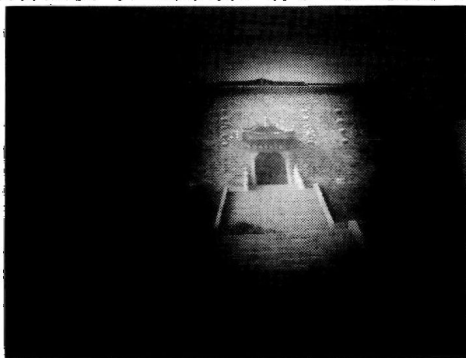
遵义进发，依据遵义建立根据地。”他的发言十分坚定，不容置疑。博古在会上，从毛泽东坚定的发言中，感到最高“三人团”正在消失，最高决定权正急速转移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的发言权越来越得到大家的认可。

毛泽东继续说：“我建议我们在遵义可以召开一次正式会议，以进一步将我们的战略方针确定下来。”见大家对毛泽东的意见没有异议。博古也不便说什么，他只在会上做了简短的发言，表示他不主张完全放弃北上。会议最后通过了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的战略任务，正式改变了红军前进的方向，这是红军战略转变的开始。

红军从黎平出发，直逼乌江，一路上击溃了阻截的敌人，1934年12月31日到达乌江南岸的猴场。1935年元旦的猴场镇，洋溢在一片新年到来时的喜庆气氛之中。这新年对于从中央苏区突围出来，连续行军作战，刚刚从生与死的考验中挣脱出来的红一方面军广大战士们来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他们也似乎暂时地忘掉了战争，忘掉了失去战友的伤痛及今后自己所可能遇到的艰难困苦，全都被节日的气氛感染，显得喜气洋洋，兴高采烈。

在战士们高高兴兴地会餐、参加游艺活动的时候，红一方面军的高层领导人却在紧张地做着强渡乌江的准备工作。这天夜晚时分，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会议开得很长，李德、博古、周恩来、毛泽东、洛甫、王稼祥等都出席了。

在这次会议上，李德和博古居然再次提出要与二、六军团会合的方针。李德说：“在贵州，红军得到



猴场会议会址

了休整,湘西的敌人已经被引过来,局势对红军会越来越坏,因此要不失时机地东进。”李德继续说道,“而且,据情报说,敌人已有三个师的兵力向我们原计划要渡过的乌江渡口开过来,已近在咫尺,我提议红军应停下来迎战,把来敌消灭。”

毛泽东听完,果断地说:“不行。蒋介石的军队和湘军主力仍集结在贵州东北方面,这正处于我们与二六军团的中央地带上。红军不能停下来与敌人的三个师交战,应当全速向遵义挺进。不然,我们尽管暂时赢得了战场上的胜利,但仍然摆脱不了敌人的追堵。”他接着强调说:“我们要冲到敌人前面去,突过乌江,来个新年开门红!”

经过激烈争论,最后,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建议,毛泽东的发言权再次得到大家的肯定。军委随即向部队下达命令:“挺进黔北,出其不意拿下遵义和桐梓,发动群众!”

政治局会议结束后,天上下起了大雪。从会场上回来的毛泽东看着大雪,兴奋地自语道:“瑞雪兆丰年啊!”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部署,红一方面军决定直奔乌江,夺取遵义。

担架上的“阳谋”

担架上的“阳谋”是指遵义会议之前,在长征路上,毛泽东利用与王稼祥、张闻天等人躺在担架上的机会讨论问题,思想逐步达成共识的过程。在经历了湘江战役之后,红一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更加强烈地意识到李德指挥的错误,也更加认识到过去毛泽东对红军指挥的正确。对于李德因为错误指挥给红军造成的损失,毛泽东感到十分痛心。毛泽东强烈地感到,必须取消李德这个惯于纸上谈兵的“太上皇”地位,红军必须改变战略决策,不然的话,红军恐怕只有死路一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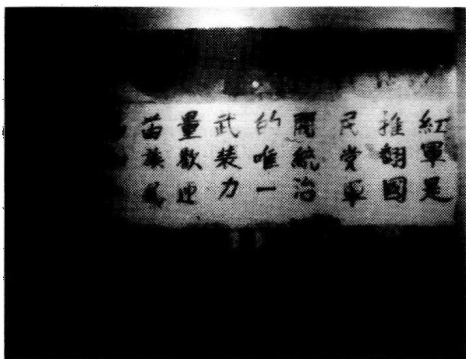
绝对不能让李德再瞎指挥下去!此时的毛泽东清楚地感到自

己有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了党和红军的命运与前途，自己必须担负这样的使命，在这种关键的时刻应该挺身而出，力挽狂澜。然而，毛泽东也清醒地知道，旗帜鲜明地反对李德、博古那一套，改变红军战略方向的时机还没有到。尽管经过湘江惨败，许多战士和领导干部对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已有了一定的认识，但对于整个战略转变毕竟缺乏认识。

毛泽东感到，要站出来表明态度，赢得主动权，目前最紧要的一步，就是要取得红军领导层中大多数人的一致意见，争取他们的支持。

首先，毛泽东想到了王稼祥。

王稼祥是安徽泾县人，这一年28岁。他1925年参加革命，同年10月赴苏联学习，先后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在那里，他受到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理论的熏染而成为王



红军在台江县留下的标语

明路线的支持者。五年之后他回到中国，不久即到中央苏区工作，担任了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重要职务。王稼祥是一个务实的同志，到中央苏区后，他开始接触毛泽东，认识到他的革命理论更加符合中国的国情，于是逐渐脱离王明的理论，转而成了毛泽东的支持者。

王稼祥发现，毛泽东身上散发着一股典型的中国人所具有的质朴气质，而这却是当时一般领导者所少有的。毛泽东还有一种领导人所特有的宽广胸怀和长远的眼光，他学习过马列著作，但是不像一般人那样把它变成教条，而是懂得灵活机动、创造性地运用。

比如对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的建军思想，王稼祥就深为折服。在对王明路线和毛泽东路线的比较中，王稼祥最终选择了后者，坚决地站在了毛泽东一边。1932年10月在中央苏区中央局召开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被撤销了红军总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的职务。只有王稼祥等少数人公开站在毛泽东一边，肯定毛泽东的战略方针，对这一决定表示不满和反对。因此，此时关键时刻，毛泽东自然想到王稼祥的决定性作用。

毛泽东想到王稼祥的同时，自然也想起与王稼祥思想经历相似的张闻天。

张闻天，又名洛甫，江苏人，34岁。他同王稼祥的早年经历一样，曾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过，所不同的是洛甫曾去过日本自学日文，还到过美国旧金山勤工俭



黎平会议会址

学，担任过一家报纸的主编，1938年进入中央苏区后任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部长，以后又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等要职。在六届五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洛甫开始也很迷信王明的理论，有过“左”倾的表现。但他为人正派，光明磊落，坚持原则。他刚进入苏区时，对毛泽东不了解也不重视，认定王明的理论是正确的。但接触到毛泽东后，他的认识就起了变化，逐渐与毛泽东的认识接近一致，而与李德、博古的主张发生了分歧。广昌战役失利后，洛甫公开批评了李德、博古的错误指挥和宗派思想。毛泽东认为，张闻天也是一个关键人物。如果他